

赓续中华文脉推动创新发展

刘水静

亘古亘今、深厚博大的中华文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为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提供丰厚滋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赓续历史文脉基础上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要求。

中华文脉蕴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基因。我们推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究竟有何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特”在哪里？思考和解答这些问题有多重角度，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化和文明的视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历史视野，深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基因和文明底色，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强调“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这一重大论断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昭示了在新的起点上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深远意义。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将赓续中华文脉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整体谋划、统筹部署、扎实推进。《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年修订）等的实施，为赓续中华文脉筑牢制度保障；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国考古博物馆，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入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建设中国特色考古学，支持发展“冷门绝学”，着力构建文化研究自主知识产权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为国家治理、社会发展提供智慧滋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校教育、融入文艺创作、融入日常生活，积极推动普及传播；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等。经过不懈努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有力巩固，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为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大正能量。

在新的起点上传承中华文脉，是更好担负文化使命，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文化根基的必然要求。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华文脉凝铸于文物古迹、文化景观等文化遗产之中。赓续中华文脉，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像爱惜生命一样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文明瑰宝呵护好、传承好。推动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中华文脉中蕴含的文化元素、艺术符号，打造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创品牌、文艺作品等，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重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将中华文脉中蕴含的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契合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经过现代阐释与转化，有机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在“第二个结合”打开的广阔文化空间中，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同时坚持文化建设的着眼点、落脚点于人民，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以优秀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坚定走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随着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金融监管也要与时俱进，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一要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加大人力和智力技术投入，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点，做好预判和防范。二要加强监管的监管。在未来的金融风险形态中，技术可能成为一个风险来源。为此，可在加强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基础上，加强对技术的监管，对金融交易、业务、产品和机构进行技术风险评估。三要建立算法审查制度。针对“算法黑箱”等现象，建立算法审查制度，提高算法的可解释性和透明度。四是尝试推出“监管沙盒”。面对具有不确定性但可能带来巨大效率提升的人工智能金融创新，监管部门可以与创新机构分工合作，创造相对宽松而科学合理的监管环境，创新机构侧重业务模式、监管部门重视风险管控，实现监管与创新平衡。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强化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天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作为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在全球相对领先的国家之一，我国有能力成为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创新应用的引领者，在合理平衡效率与稳定的前提下，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使之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应有贡献。



淮南日报社 理论部

“淮楚文化”学术体系的当代构建

高旭

严格意义上，“淮楚文化”的出现是楚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新生事物，意味着古今淮河流域内楚文化的发展演变及历史影响开始得到学界关注与重视，其开始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被学者们深入探讨。在界定阐释“淮楚文化”概念的基础上，是否能够根据古今淮河流域内楚文化的发展演变事实来逐步构建起“淮楚文化”的新的学术体系，也自然成为引发学者们进一步思考的重要议题。对此，我们或可从以下四点有所初步认识：

第一，“淮楚文化”学术体系的构建乃是基于楚文化对古今淮河流域产生深刻影响的客观事实。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来，随着楚国对淮河流域四百余年的长期经略，楚文化已深度烙印于淮河流域的广土沃壤之上，已毫无争议地成为影响淮河流域内广大民众思想精神及风俗习惯的历史文化基因。无论是淮河上游，还是淮河中游、下游，都有着十分丰富的楚文化遗存，其中尤以古“陈郢”（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古“寿郢”（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为代表。2024年，淮南市武王墩墓的考古发掘成果，再一次充分证明了淮河流域在楚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特殊地位及影响。因此，重新审视楚文化与淮河流域之间的历史关系，对淮河流域内楚文化遗存展开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其丰富而独特的学理内涵，探索构建别具流域性特色、地域性特色的“淮楚文化”学术体系，便是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研究实践。换言之，如若缺少异常丰厚的历史遗存的支持，不但“淮楚文化”学术体系的构建只会是虚谈空论之学，就是“淮楚文化”这一概念的界定阐释也无从成立。正由于楚文化同淮河流域有着紧密难分的历史缘分，是古今淮河流域内广大民众赖以繁衍生息的文化血脉所系，方能让“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以及“淮楚文化”学术体系的探索构建，拥有现实的可能性、必要性及重要性。

第二，“淮楚文化”概念的界定阐释，为“淮楚文化”学术体系的逐步构建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学理基础。任何楚文化学术体系的构建，都必须首先解决核心概念的界定阐释问题，这是学术体系能否真正得以构建的关键所在。虽然当前“淮楚文化”概念的界定阐释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关于其内涵的学术共识还有待逐渐形成。在不断深化对“淮楚文化”概念研究的同时，推动“淮楚文化”学术体系构建问题的讨论，并非无根之举，而是有其重要的学术前瞻意义。从古今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演变的全局出发，将“淮楚文化”概念的研究同“淮楚文化”学术体系构建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进行，能对二者的学理深化认识产生积极的互动促进作用，让学界更能看到“淮楚文化”研究领域的产生对于全国性楚文化研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及意义。

第三，立足“淮楚文化”概念所揭示出的流域性、地域性内涵，可对“淮楚文化”学术体系的基本构成有所揭示和把握。“淮楚文化”学术体系所含的研究对象及具体内容可概括为八个方面：一是淮楚文化史研究。着眼古今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演变的情况开展历史维度的系统研讨，论述阐明“淮楚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内涵及特点，形成对“淮楚文化”发展全貌的总体认识；二是淮楚文化的流域性、地域性内涵研究。从流域性视角出发，对楚文化在淮河流域的上游、中游、下游的历史遗存及影响分别展开研讨，深入把握楚文化在淮河流域不同空间范围内的衍生流变情况。与此同时，聚焦古今淮河流域内的重要城邑、城市，发掘楚文化的地域性内涵，揭示代表性城邑、城市的地方特色。结合流域性、地域性的双重视角，逐渐形成对淮河流域楚文化的“点”“线”“面”的立体化认知，从空间维度上突出“淮楚文化”的独特性、重要性；三是淮楚文化的考古学内涵研究。现代意义上的楚文化研究，从诞生伊始，便与考古学结成密不可分

的特殊关系。淮河流域内存在大量的楚文化考古遗存（以楚“郢”遗址、各种等级的楚墓和楚国水利灌溉工程遗迹为代表），从考古学视角出发，系统厘清楚文化在淮河流域内的发展成就，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四是淮楚文化的哲学思想内涵研究。淮河是中国道家的母亲河，淮河流域自古以来便是孕育道家哲人的灵秀之地、浪漫之所，而以老庄道家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又是楚文化的哲学灵魂，因此开展对淮楚文化哲学思想的研究，是深透把握淮楚文化根本的精神特质的肯綮所在；五是淮楚文化多样化的文化内涵研究。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进程中，淮河流域楚文化于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商贸文化、科技文化、军事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水利文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器物制造、交通运输等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这些都是淮楚文化需要深入研究的具体对象，是展现淮楚文化丰富性内涵的重要载体；六是淮楚文化基本特色及内在精神研究。楚文化在淮河流域的历史演变既与其在长江流域的发展保持着内在的连贯性、一致性，又有着不同于后者的特殊之处。着眼淮河流域的自然人文环境及政治发展情势，探讨淮楚文化的基本特色和内在精神，是从整体上揭示淮楚文化所具独特性的重要议题；七是淮楚文化同荆楚文化、湘楚文化、巴楚文化、吴楚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楚文化的演变发展存在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流域性、区域性及地域性往往纠缠在一起，形成了荆楚文化、湘楚文化、巴楚文化、吴楚文化、淮楚文化等多元化内涵。将淮楚文化同其他形态楚文化进行多视角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学界准确把握淮楚文化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助于不断深化对楚文化整体性内涵与多元化内涵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让人们看到楚文化既博大精深，又异彩纷呈的历史面貌；八是淮楚文化现代传承创新研究。淮楚文化与淮河流域内相关省份、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亟需探索互动

促进的实践路径，需要面向现实，结合文旅经济、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活化利用研究，使之发挥出以“文”促“旅”、以“文”兴“业”的可贵效能。善于把淮楚文化的学术研究和淮河流域生态经济带转型发展的国家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为沿淮省份、城市注入新的动能，是实现淮楚文化古今一体、贯通而用的必由之路，也是彰显淮楚文化现代价值及意义的重要方式。

第四，关于“淮楚文化”学术体系构建的思考需要学界长期关注、重视与研究。任何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学术体系的构建，都绝非一日之功，更遑论“淮楚文化”不论是概念的界定阐释，抑或是学术体系构建的审慎探讨，都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学界逐渐在积极争鸣中凝聚共识，形成能为社会各界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一般性认识。在某种意义上，提出“淮楚文化”学术体系构建的主张，乃是体现前瞻性的理论探索，尽管解决这一重要议题的学理基础仍显薄弱，但如若放眼淮楚文化的历史内涵及发展前景而言，却并非贸然之举、无根之谈，而是显露出长远的学术眼光。随着学界对“淮楚文化”研究的日益深入，对于“淮楚文化”学术体系构建的可能性、必要性、重要性及迫切性，或许会越来越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越来越成为推动“淮楚文化”研究纵深发展的积极因素。

综上所述，提出并初步探讨“淮楚文化”学术体系的构建问题，是与“淮楚文化”概念的界定阐释一样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正因楚文化在淮河流域的历史印记至为深刻，历史遗存甚为丰厚，历史影响极为深远，故此从学术体系构建的视角出发，全面系统地梳理“淮楚文化”的研究内容，准确把握历史演变线索，突显其整体性的文化特色及内在精神，促使“淮楚文化”历史遗产更好地服务于沿淮省份、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可谓是兼具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有益探索，其开拓性、创新性的学术价值，显而易见。

如，依托跨境电商等平台，扩大文化产品出口，利用大数据精准匹配国际市场需求；建设数字文化贸易平台，推动文化贸易全链条数字化，从版权交易到支付结算实现高效透明等。高质量发展文化贸易绝不是单向输出，其本质是通过提升文化贸易的质量效能、创新浓度和价值厚度，搭建起中外文明对话的桥梁。近年来，一些文化IP在全球市场中的跃升，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要求突破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局限，推动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实现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型和结构升级，提升数字文化产品、版权服务、创意设计等知识密集型业态占比。例如，大量优秀网络、网络文学、网络游戏走向海外，不断丰富文化“走出去”的种类，并不断打造集创意、产品、品牌、营销发行等于一体的全方位服务体系，推动文化的破壁传播，提升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还应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之中。国内大循环重在激活文化消费市场，打通文旅融合链条；国际循环则须构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贸易走廊，推动技术标准、商业模式的系统出海。这种内外联动机制，使文化贸易成为畅通经济循环、促进文明互鉴的战略枢纽。比如，大科技信贷是我国起步较早、相对成熟的金融创新业务之一，其核心是通过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的信用风险评估，对潜在借款人的行为进行分析并作出高质量的信贷决策。这对于推动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部分民营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抗风险能力较弱等原因，在金融市场中相对弱势，融资可得性、可及性差，表现为融资难；对能够获得融资的民营企业来说，金融机构为覆盖风险，在贷款利率中增加风险补偿，导致了融资贵。大科技信贷能够有效克服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一个大科技信贷平台可以同时为上千万甚至上亿的个人消费者或中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服务。

又如，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会改变金融风险的形成与传导机制。在传统金融体系中，许多中小微企业以抵押品来获取银行信贷，这样就会在抵押品价格与银行信贷供给之间形成一个正向反馈机制，即抵押品价格越高，信贷供给越多。这同时又会进一步推高抵押品价格，反之亦然。这显然不利于保持金融稳定，有学者用“金融加速器”来形容这一过程。一些研究发现，当信

文化贸易扬帆出海正当时

李嘉珊

2025年第8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提出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当下，促进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更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选择。

文化贸易是连接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的纽带。近年来，一些国产文学作品、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剧成功“出海”，到中国旅游成为海外民众的新时尚，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力量、对外开放的力量。无论是文学作品《三体》，还是网络游戏《黑神话：悟空》，都在海外传播中具有广泛影响，是文化贸易获得成功的经典案例。不断培育文化贸易新优势，推动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与互鉴都具有重要意义。

高质量发展文化贸易需要以技术创新赋能内容创作与生产。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在此背景下，文化贸易的

数字化转型呈现出显著的创新特征，基于数字基因的动漫、网络游戏、数字影视、交互出版等新业态，已构建起文化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承载文明密码的传统文化资源，亟待通过数字化转型与IP化开发形成新型文化供给体系。一方面，须巩固先发优势，依托相对成熟的工业化生产体系，提升创意研发、智能制作、跨境运营的全链条服务能力，持续扩大沉浸式娱乐、虚拟偶像、互动叙事等数字文化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应深挖传统文化富矿，运用数字孪生、扩展现实等技术对文物、非遗、典籍等进行多维解码，通过“文化数据库+创意算法”的模式孵化新型文化衍生品，构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数字文化贸易新生态。这种战略转型不仅强化了我国在全球数字文化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更能为文化基因的数字化传承开辟创新路径，为全球文化经济市场提供丰富优质供给。

通过品牌建设提升国际市场价值是重要方式。国际品牌建设是我国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之举，亟须

立足文化贸易发展现状充分挖掘文化资源，增加其市场转化率；强调品牌创新，注重品牌差异化和独特性，提升产品竞争力；发挥集群优势，运用国际化运营模式实现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跃升。此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要求突破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局限，推动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实现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型和结构升级，提升数字文化产品、版权服务、创意设计等知识密集型业态占比。例如，大量优秀网络、网络文学、网络游戏走向海外，不断丰富文化“走出去”的种类，并不断打造集创意、产品、品牌、营销发行等于一体的全方位服务体系，推动文化的破壁传播，提升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还应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之中。国内大循环重在激活文化消费市场，打通文旅融合链条；国际循环则须构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贸易走廊，推动技术标准、商业模式的系统出海。这种内外联动机制，使文化贸易成为畅通经济循环、促进文明互鉴的战略枢纽。比

利用人工智能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

黄益平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加强金融创新是重要手段。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新领域，为推动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提供了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市场空间巨大。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整体发展已进入全球第一梯队，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从前台营销到后台运营再到分析决策，人工智能的应用几乎贯穿金融服务整个链条。其中，比较重要的应用场景包括：通过大规模信息处理，提供基于自然语言的、能够实现快捷有效沟通的客户服务；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识别异常交易和潜在的欺诈行为；基于个人数据和行为模式，对借款人信用进行评估预测；利用算法和数据分析，为投资者提供个性化投资建议；等等。总的来看，通过更好地处理金融数据、预测市场趋势、优化客户服务和管理金融风险，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为改善金融服务质量提供了重要支撑，发挥着扩大规模、提升效率、改善用户体验和降低成本、减少接触、控制风险的作用。

比如，大科技信贷是我国起步较早、相对成熟的金融创新业务之一，其核心是通过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的信用风险评估，对潜在借款人的行为进行分析并作出高质量的信贷决策。这对于推动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部分民营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抗风险能力较弱等原因，在金融市场中相对弱势，融资可得性、可及性差，表现为融资难；对能够获得融资的民营企业来说，金融机构为覆盖风险，在贷款利率中增加风险补偿，导致了融资贵。大科技信贷能够有效克服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一个大科技信贷平台可以同时为上千万甚至上亿的个人消费者或中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服务。

又如，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会改变金融风险的形成与传导机制。在传统金融体系中，许多中小微企业以抵押品来获取银行信贷，这样就会在抵押品价格与银行信贷供给之间形成一个正向反馈机制，即抵押品价格越高，信贷供给越多。这同时又会进一步推高抵押品价格，反之亦然。这显然不利于保持金融稳定，有学者用“金融加速器”来形容这一过程。一些研究发现，当信

贷机构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替代抵押品做信贷决策时，所谓“金融加速器”机制就不再起作用，这有利于保持金融稳定。这启示我们，在关注人工智能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同时，也要关注人工智能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作用。

同时需要看到，人工智能仍然在快速发展与迭代过程中，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也刚刚起步，很多业务形态尚未成熟。比如，在被市场寄予很高期待的智能投顾领域，成功案例还相对较少。这也说明，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宜操之过急。

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可能产生新的金融风险的担忧。比如，数据泄露会引发数据安全问题，给一些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如果算法透明度不够，出现“算法黑箱”，就容易导致金融决策偏离初衷；存在道德风险和伦理问题，包括出现算法在数据处理和决策中反映出人类的偏见，导致不公平的结果等问题；不同机构使用相似算法，容易产生风险集中问题，可能导致“羊群效应”“同步共振”，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金融监管机构密切关注。

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近年来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人工智能具备典型的通用技术特征，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能够在几乎所有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金融领域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对于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赋能应用，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和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多篇著作对金融发展作出了深刻论述。比如，《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指出：“要扎根于为实体经济服务、适应消费者和投资者需要进行金融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指出：“为了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金融系统要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文章”；《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指出，针对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顺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关系，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等等。这些重要论述为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指明了方向。